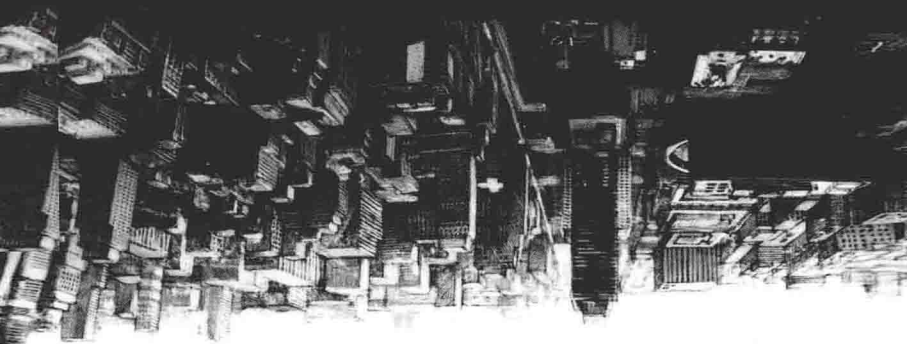


杨庆祥
●
著

80后， 怎么办？

从大时代到小时代
从绝望中寻找希望

我们是谁？我们往哪里去？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80后， 怎么办？

杨庆祥 ● 著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80 后, 怎么办? / 杨庆祥著. — 北京: 北京十月

文艺出版社, 2015.6

ISBN 978-7-5302-1499-2

I. ① 8… II. ① 杨… III. ① 随笔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① 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098042 号

责任编辑 赵雪芹 郭爱婷

责任印制 李远林 管超

装帧设计 7 拾 3 号工作室

内文制作 品欣工作室

80 后, 怎么办?

80HOU, ZENMEBAN?

杨庆祥 著

出 版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北京北三环中路 6 号 邮编 100120

发 行 新经典发行有限公司
电话 (010)62026811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市中晟雅豪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1/32

印 张 7.5

字 数 118 千字

版 次 2015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302-1499-2

定 价 29.80 元

质量监督电话 010-58572393

版权所有, 未经书面许可, 不得转载、复制、翻印, 违者必究。

献给我的同时代人

——题记

目录 Contents

80 后，怎么办？

- 一、失败的“实感” / 003
- 二、历史虚无主义 / 017
- 三、抵抗的假面 / 033
- 四、沉默的“复数” / 047
- 五、从小资产阶级梦中惊醒 / 068
- 六、怎么办？ / 101

80 后，面对面

- 一、我们这一代没有真正的青春 / 123
- 二、我依然属于弱势群体 / 159
- 三、能够受到一些公平的待遇就可以了 / 177
- 四、现在做不起梦了 / 198
- 五、我们是比 50 后、60 后和 70 后更幸福的一代人 / 218

80后，怎么办？



一、失败的“实感”

1

2011年1月17日，在时任国家主席胡锦涛访美前夕，由中国国务院新闻办筹拍的《中国国家形象片——人物篇》在美国纽约时报广场的大型电子显示屏上循环播放，据相关媒体报道：“这则宣传片以中国红为主色调，在短短60秒钟时间内，展示了包括邵丽华、吴宇森、宋祖英、刘欢、郎平、姚明、丁俊晖、袁隆平、吴敬琏、杨利伟在内的，涵盖文艺、体育、商界、智库、模特、航天等各行各业的数十个杰出华人，以‘智慧、美丽、勇敢、才能、财富’等诠释中国人形象。”在2008年成功举办第29届北京奥

运会之后，中国政府正紧锣密鼓地向世界展示自己的“成功”形象，国家形象片不过是中国向世界递出的又一张名片。北京奥运会总投入为3000亿，2010年广州亚运会总投入为1200亿（是南非世界杯的5倍，是1990年北京亚运会的50倍）。这些天文数字似乎一再证明了中国近30年改革的巨大成功，但同时也让人疑窦丛生，这些花费无数的盛会，这些被巨大的摄像头所截取的场景、人物，究竟能“代表”什么？究竟又代表了“谁”？

毫无疑问，59位进入国家形象片的中国人都是某一种成功的代表者，但这种“成功”因为经过镜头和意识形态的包装后反而显得空洞无物，我不想从技术的层面来分析这个问题，我只是仅仅从我的感受出发：我在观看这一国家形象片的时候没有任何的激动和兴奋，就好像是在观看一个和我毫无关系的表演。这是一个过于宏大和遥远的叙事，它没有办法和我当下的生活发生任何有效的联系，中国国家形象片在纽约时报广场播出仿佛就是一个被虚构出来的场景，至少对于我而言，它失效了。

想起来这种失效是不应该的。仅仅是在两年前的2008年，我还挤在人山人海的小咖啡屋里面，和很多的年轻人一道观看北京奥运会的开幕式，沉浸在“大

国崛起”的亢奋想象中。那个时候我同样是一个局外人，但我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而是通过想象把自己与大多数的中国人联系在一起，并想当然地认为国家的梦想就是个人的梦想，国家的光荣就是个人的光荣。但是这一次，这种想象被我个人严峻的生活现实所击碎，也就是在国家形象片播出的前几天，我所租住的公寓房东毫不留情地通知我，不再续租，另谋住处。这就意味着我和我寓所里面的另外三个年轻人都必须在一周内搬出这个我们住了一年多的房间。房东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他觉得把房子直租给我们赚不了太多钱（实际上他每个月从我们四个人身上收取了整整5000元。其中根据每个房间的大小四个人分别承担1100/1600/1000/1300元），因此直接整租给房屋中介公司。中介公司则会通过不合法的手段改造出更多的空间（比如把一居室改造为三居室，把三居室改造成五居室）来赚取更多的租金。从2009年9月博士毕业至今，一年半的时间，这已经是我第三次换租。最开始的时候我租住在人民大学南边的三义庙小区，这是一个上世纪80年代的筒子楼，我租了其中一个12平方米的小房间，不能洗澡，不能做饭，三层住户十几家共用一个公共厕所，月租800元。我在这个地方坚持生活了近三个月，之所以说是坚持，是因为我每天必

须骑车15分钟左右去附近的人民大学解决吃饭、洗澡等等生活问题。最后随着严冬的来临我不得不放弃了这个住处。第二个住处是海淀南路的一个合租房，我租住了客厅的一个小隔间，大约12平米，没有厨房，但有单独的洗澡间和卫生间，月租1000元。但非常要命的是，因为房间的一面是用毛玻璃隔起来的，所以隔音和隔光的效果非常不好，也就是说，房间里面的所有动静在我的隔间里面都能听到，这对我的睡眠构成了挑战。最开始的方法是等所有人都睡了我再准备睡，但后来发现行不通，因为每个人的作息时间很难协调，往往是我快要睡了的时候，突然有个人跑到洗澡间去洗澡了，或者是到客厅打开灯拿什么东西，于是我就会被吵醒。后来我不得不求助于眼罩和去噪音耳塞，把自己严严实实地与外界隔离起来，成为我每天晚上的必备功课。李陀先生有一次跑到我的住处，当他听说我对面的隔间住的是一对年轻夫妇时，突然很认真地问了一个问题：“那他们做爱怎么办？岂不是都被你们听到了？”我这才意识到这个问题，才奇怪地发现我很多次听到那对夫妻为了各种生活琐事吵架的声音，却一次也没有听到过他们做爱发出的声音。在一个如此简陋的出租房内，或许他们已经没有做爱的欲望了吧。在这个房间住了大概半年时间，因

为中介公司和房东之间发生了纠纷，我被通知换租。于是又搬到了小南庄，也就是我现在的住处，这是一个三室一厅的房间，我租了其中一个大约14平米的小单间，月租1300元。总算住到了一个稍微正式一点点的房间，我以为从此就可以高枕无忧，安心地工作生活了。但房东变相的“逐客令”又让我措手不及。

选择这种稍显屈辱的租房方式是迫不得已的。在2004年以前，人民大学的青年教师可以在校内分到一间小房间作为“过渡房”。但2004年以后，为了响应国家住房改革制度，这一政策取消了。而每个月的收入又不够去租住过于昂贵的房子，更重要的是，因为租房市场缺乏有效的监督和管理，给租房者造成了不必要的混乱和损失。我这种简单的租房经历可能在很多年轻人身上都发生过，如果站在一个个体的角度来看，可能这是很平常的生活阅历，也没有必要拿出来讲述，实际上，在北京有很多人的居住条件比我更简陋。我和李陀先生曾一起去人民大学附近的地下出租房观看，在北京的大多数高层建筑下面都有地下室，这些地下室本来可能是用于泊车或者储存货物，但现在大部分都被出租出去，建成一个个小鸽子笼一样的房间。很多的小公司就把自己的员工安排住在这种地方，这些地方潮湿、阴冷，空气不通畅，安全设备简

陋，我和李陀在观看这些地方时的第一反应是，如果发生火灾或者其他的自然灾害怎么办？在人民大学附近的紫金大厦的一个地下房间里面，一个80后的女生笑着对我和李陀说：“你们是来租房的吗？如果条件允许，我建议你们千万不要住在这里，住久了会生病的。”她说这话的时候面带笑容，丝毫没有抱怨之意，难道这不是中国人的另外一种勇敢和坚强吗？她当然没有意识到，在国家的形象宣传中，她已经被另外一些人“代表”，而她的这种坚强和挣扎，也已经被过滤掉了。

2

我承认我因此充满了沮丧感。正是在那些宏大的故事和宣传中，一种更显而易见的失败被凸显出来了。也许这一失败首先是个人的，在一个财富如此快速增长的国家，在GDP高速领跑世界的中国，我们被时代淘汰了，我们买不起甚至租不起房子，不能回报家庭和社会，不能按照自己的意愿来安排生活，甚至是一次简单的做爱。在1968年欧洲学生运动中，

其学生领袖曾质问法国教育大臣：“政府花费如此多的钱来修建一个豪华的游泳池，那政府有没有想过怎么解决学生的性爱问题？”我房间里面的那对小夫妻却没有这种质问的机会，也许他们只能让声音再小一点，更小一点，或者干脆放弃。2004年我到人民大学攻读硕士学位的时候，周边的房价在4000元左右，但5年后的2009年，已经疯涨到了30000元，稍微好一点的小区已经在45000元左右。2010被称为房地产市场最严格的“调控年”，政府的相关负责人一再表示会尽力控制房价，但从10月份开始，房价逆势反弹，我所在的小南庄一带，上世纪80年代的二手房从10月份的30000每平方米涨到了12月份的33000每平方米。也就是说，如果你在10月份买下一套100平方米的旧房子，在两个月后转手就可以赚到30万。30万意味着什么？在网上流传着一个“恶搞”的计算方法，内容如下：

你要不是三大式人物（大款，大官，大腕）而想在北京买套100平方米总价300万的房，社会阶层所付出的代价是：

- 1 农民：种三亩地每亩纯收入400元的话，要从唐朝开始至今才能凑齐（还不能有灾年）；
- 2 工人：每月工资1500元，需从鸦片战争上班至

今（双休日不能休）；

3 白领：年薪 6 万，需从 1960 年上班就拿这么多钱至今不吃不喝（取消法定假日）；

4 抢劫犯：连续作案 2500 次（必须事主是白领）约 30 年；

5 妓女：连续接客 10000 次，以每天都接一次客，需备战 10000 天，从 18 岁起按此频率接客到 46 岁（中间还不能来例假）……

以上还不算装修、家具、家电等等费用。

这个清单在一定程度上就是我们面对的现实。在这样的现实中，我们如何来讨论所谓的“个人奋斗”问题？我们知道，在从 80 年代到 90 年代的文化想象中，一个最大的问题转换就是把个人从集体中剥离出来，劳动从一个有尊严的对象性活动变成了一种“商品”，社会解放的话语也被个人奋斗的话语所取代。个人奋斗意味着，必须在一个有效的时段内获得社会承认的利益和资本。如果说在 80 年代我们还能看到这种“奋斗”实现的可能性，在 2010 年，作为一个中国的普通青年，我完全看不到哪怕一点点的希望。在近年热播的电视剧《奋斗》中，讲述了一群 80 后青年的奋斗故事，如果从意识形态的角度来看，这完全是

一个虚假的叙事，因为在这群年轻人的背后，都有着雄厚的“先在资本”，正是因为有这些先在资本的铺垫，“奋斗”才有其实现的可能性。对于大多数的年轻人来说，《奋斗》中青年人的起点可能是一生都难以企及的终点。80年代《平凡的世界》中的孙少平虽然出生贫寒，但是他可以凭借自己的劳动获得尊严，并改变自己在历史中的位置。现在看来，这是80年代对于改革的一种乐观的想象，今天我们发现，孙少平们已经无路可走了，因为资本的配置完全不利于孙少平们的成长。在2013年出版的中篇小说《涂自强的个人悲伤》中，出身贫寒的80后青年涂自强通过自己的努力考上了大学，他以及他身边的所有人都以为这是一次命运的突变，他觉得自己从此会走在一条“新路”上，会成为一个新的“成功者”，为此他充满了新自由主义式的（实际上是穷人式的）对生活的感恩：

涂自强觉得自己从未有如此充实和愉快的生活。他觉得人生太美好，而自己的力量很强大，更觉得这世道的人心十分善良。他想，等老了，儿孙满堂了，要带他们沿着这条路走一趟，告诉他们，他们的爹他们的爷爷，就是顺着这条路走到幸福生活里去的。

可事实并非如此，实际上从一开始，他就生活在一个相对固化和定型的社会秩序中。涂自强拥有难以想象的忍耐力和近乎自虐的“个人奋斗”的精神，他每个月的生活清单是：

房租加水电：140 元

吃饭：300 元

乘车及电话费：120 元

生活杂用：40 元

机动：50 元（买换季衣服及鞋等）

总计：650 元

即使如此，失败依然不可避免——没有爱情，没有稳定的工作和收入，缺乏基本的生活和医疗保障，最终以身患不治之症而终结了自己短暂的一生——涂自强不得不以一种“自我归罪”的方式来回答自己的困惑：

这世界于自己是哪里不对呢？是哪里拗着了呢？
莫不是，这就是人们所说的我有原罪？倘若有，那是什么？是生在山里？是长在贫民之家？是在这世上无依无靠？这些难道本就是我的原始创痛？